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曹 普

摘 要 2024 年是邓小平诞辰 120 周年。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回顾和缅怀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作出的卓越贡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推动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是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

关键词 邓小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开创

作者曹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 100091)。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 120 周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扎根中国大地、体现时代特征的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认识上的巨大新觉醒。正是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力奋斗 40 多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回顾和深切缅怀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作出的卓越贡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推动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是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

一、振聋发聩的“邓小平之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求索,迈出了“披荆斩棘、开通道路”^②的第一步,取得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

质基础。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多方面原因,党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始终一贯地完全坚持下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酿成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③,教训极为惨痛。“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完全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严重脱离中国实际,非但没有达到建设美好社会主义的目标,反而极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本已存在的差距在此期间进一步拉大了。1977 年邓小平再次复出伊始,就引导全党痛定思痛,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鼓吹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④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打出沉重问号。

1977 年底,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邓小平指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⑤1978 年 2 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就要物质极大丰富。”^⑥同年 3 月,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

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①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是发出了重新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信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结合改革开放新实践新认识，在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邓小平继续扭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不断“追问”和求索。比如：1981年3月，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他说：“‘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谬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甚至污辱。……难道穷就是社会主义吗？农民收入增加是不是资本主义？靠自己的劳动成果增加了收入，这是什么资本主义？”^②1984年6月，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③1985年4月，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④同年8月，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他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⑤1986年9月，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又说：“究竟什么叫社会主义？有没有穷的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过去我们解决得不好。”^⑥1987年4月，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中国“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⑦同月，在会见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时，又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⑧1988年6月，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在‘文革’的10年中，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⑨1991年8月，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⑩邓小平如此不厌其烦地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表明在他看来，这个问题重大而关键，是反思过去所为、思考未来出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大变动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首当其冲、不容回避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⑪。

邓小平一再提出和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至少基于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先是中国自身的经验教训。如前所述，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先后发生“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严重挫折，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说到底，是和没有搞清楚或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战略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有重要关系。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分析“大跃进”失误时表示：“对社会主义，我们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⑫。1969年2月，在与陈毅、李富春、徐向前等谈话时，他又说：“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⑬其次是苏联的经验教训。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被认为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怎样？1980年1月，邓小平评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⑭1985年8月，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

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再次是非洲等国的经验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非洲盛行，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但很多国家却越搞越穷。对此，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中央委员布拉希米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③1988年5月，在北京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他这样建议客人：“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④

二、“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拨乱反正，打开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通道

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⑤、走什么路的重大选择。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继续肯定和维护“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路线的老路，一条是否定和背弃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根本方向的邪路，还有一条，是科学总结经验、深刻汲取教训，立足国情和时代变化去大胆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邓小平的引领下，我们党不走封闭僵化老路，更不选择改旗易帜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上了通过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新路的开创，殊非易事，首先遇到的是“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做法，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为新形势下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告别老路、开创新路设置了障碍。邓小平尖锐指出：“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⑥；“‘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⑦主要是因为“两个凡是”的推行，使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里，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虽有所前进，但在根本指导思想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仍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框架内“抓纲治国”，拨乱反正每迈进一步都十分艰难。

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高超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⑧1977年4月，尚未正式复出的邓小平就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⑨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⑩他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号召全党“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⑪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更是振聋发聩地警示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⑫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改革开放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先导。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起点。这次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口号，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党和国家工作结束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伟大转变。以这次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拉开。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②这表明，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在改革开放中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胜利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同时，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特点从十个方面作了概括，实质上初步阐述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的提出，科学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全党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成为指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重点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

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④——这是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这9年，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显著成就，其中经济建设成就尤为突出。这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发展屡遭挫折，人民生活改善甚微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际，对这9年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进行深入总结，概括9年来我们党坚持和形成的基本路线，规划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发展战略，保证我国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胜利前进，是党面对和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三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邓小平直接指导了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和大会的筹备工作，他明确要求：“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⑤。党的十三大的最主要贡献，是根据邓小平的相关重要论述，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大会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⑥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大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从12个方面作出系统概括，第一次较为清晰地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

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我国也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等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习近平后来就此评论：“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徘徊了。”^⑨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有力支持下，平息了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在西方“制裁”面前，邓小平告诫经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建立的新中央领导集体：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对此要旗帜鲜明地坚决顶住；“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⑩1992年初，当着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谷，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邓小平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四大作出三大决策，要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严峻考验，“一枝独秀”铿锵前行，在持

续推进中打开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天地。

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回答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回答，贯穿了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构成了由党的十五大命名、由邓小平作为主要创立者的“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首要理论问题。

(一)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思考

由于长期“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以至于出现了“种种常人想象不到的奇谈怪论，什么‘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强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⑪，甚至认为“越穷越是社会主义”^⑫，严重忽视发展生产力，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彰显。“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更是“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⑬。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⑭

从1978年到1991年，邓小平不下二十次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作深入思考，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忽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忽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状况，离开生产力标准去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

式裁判生活，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深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④“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⑤1980年5月、1985年8月、1990年12月、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4次谈及“社会主义本质”。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他首次全面、精辟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这个概括，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落脚点，以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过程和重要条件，廓清了不合乎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模糊观念，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对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揭示，是在排除了哪些不属于社会主义——包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以坚持人所共知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基本规定性的核心要素——党的领导、

公有制主体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等——为前提提出来的，是基于我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以及当时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些不正确认识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应战性。

在努力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搞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什么阶段。1987年4月26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⑦“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主要是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角度对中国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判定，揭示了中国的最大国情。

早在1977年10月，邓小平就说过：“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⑧1979年3月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⑨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但是，它还不成、不完善。”“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⑩这个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作了基本估计，已经蕴含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思想。之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1982年党的十二大、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又3次使用“初级阶段”概念，但对其具体涵义都未作展开阐述。1987年3月，负责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的中央领导给邓小平写信，提出党的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得到邓小平的赞同，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⑪同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邓小平介绍：“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

主义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②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阐述，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③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问题又多次发表谈话，比如，1988年6月在同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谈话时，他说：1957年下半年后中国之所以犯“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④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中，他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⑤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理解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提供了一把钥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国情判断方面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特色和创造，归根结底，都建立在对国情正确认知这个基础之上。

（二）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探索和科学回答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创造性贡献，集中体现为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1985年4月，邓小平在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谈话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⑥同年8月，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他又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⑦从这两段谈话，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从根本上成功解决好的问题。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⑧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历来的观点；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则是邓小平独具匠心的创见。关于改革，邓小平提出了以下重要观点：关于必要性，邓小平指出：“不改革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⑩；“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⑪关于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⑫关于改革的方针，邓小平指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⑬。关于改革的步骤，邓小平指出：“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我们就转到城市”。^⑭关于改革的范围，邓小平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⑮关于改革的危险，邓小平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

能停步不前”。^⑥关于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邓小平指出：“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关于改革的目的，邓小平指出：“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赶上时代”。^⑧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外部世界——主要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实践中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之一。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要勇敢“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凡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要“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我国“赶超”的起点^⑨。邓小平反复强调，“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⑩他大声疾呼：“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⑪经过40多年不懈努力，中国以兴办经济特区为突破口，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重大标志，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新的抓手，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强大动力与活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历时46年。邓小平曾这样阐述和展望中国改革的远景：“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的前进。”^⑫邓小平几十年前说的这些话，对于新时代我们清醒观察和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

略主动，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和做法。中国的改革是全面、全方位的，但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⑬，带动其他各方面各领域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在逐步打破旧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我国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究竟是什么样的体制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这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长期的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就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进行深入思考，先后十几次谈论这个问题，观点越发明晰，为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还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⑭党的十二大后不久，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⑮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这样一个重大理论突破，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有些新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

学”。^⑥1985年10月，在回答外宾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提问时，邓小平回答：两者“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⑦。在党的十三大准备过程中，邓小平指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⑧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有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左”的认识，邓小平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⑩在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中，他的观点更为鲜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⑪邓小平提出的“两个不等于”，直击要害，从根本上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作了精辟、透彻的总回答，解除了长期这个问题上的“紧箍咒”。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实践，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具标志性、突破性的重大贡献之一。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中国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邓小平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高瞻远瞩指出了科技、教育、人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性作用；提出了“三步走”战略论，勾画了到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目标蓝图；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和精神文明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下进行，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和国防战略论，阐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及安全保障；提出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论，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特殊难题；提出了党的建设论，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使党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等等。这些重要思想理论观点，体现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系统性思考，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完整体系。正是在这些重大思想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使1978年以后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四、邓小平的贡献是“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以及在改革开放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才过上了小康生活，中华民族才能以崭新的更加昂扬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中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在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对于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所提供的更多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难以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列宁晚年就这个问题进行

深刻思考，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同样没有来得及作出完满回答；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披荆斩棘的艰辛探索，取得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最终也未能成功解答这一问题。成功地又是初步地回答了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是邓小平及其创立的邓小平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引领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困局，通过改革开放，逐步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勃兴发展的新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是邓小平领航定向，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处于低潮之际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于大考验、大变局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对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江泽民、胡锦涛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光明前景。习近平评价：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⑧

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党的重要文献曾作出权威论述。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不断开拓中前进的。在邓小平重点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集中体现这些“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谱系的创始理论、奠基之作。

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也会出现曲折，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30多年前，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处于低潮之际，邓小平就坚定表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

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语重心长叮嘱全党：“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⑧今天我们可以告慰邓小平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正成为 21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也要清醒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推动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同心戮力，不懈奋斗。

注释：

①⑧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8 月 21 日。

②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27 日。

③④⑫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

④⑫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5、250、192、298、38、119、143、173、312、128、314、163-164、150、236 页。

⑤⑥⑦㉚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0、271、277、157、220 页。

⑧⑫⑭《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24、1142、982 页。

⑨⑩⑪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3、116、137、223、227、369、139、313、261、3、203、320-321、172、373、225、252、269、370、379-380、117、137-138、370、242、368、142、174、113、372、237、117、237、267、229、372、134、135、242、78、373、131、268、16、17、83、91、148、203、364、367、373、382-383 页。

⑮《邓小平会见门格斯图时说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人民日报》1988 年 6 月 23 日。

⑰⑱《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9、9 页。

⑲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68、1541 页。

㉗《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8 页。

㉘《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1-52、53、55 页。

㉚㉛㉜㉝㉞㉟《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57、9、27 页。

㉟㊱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2022 年第 18 期。

㊱《四个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批判“四人帮”反对四个现代化的滔天罪行》，《人民日报》1977 年 3 月 12 日。

㊳《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8 页。

㊵《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0、233 页。

㊷《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07-1309 页。

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人民日报》2024 年 5 月 1 日。

㊻《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 页。

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 页。

㊿《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 页。

[责任编辑：王珂]